

2010 年以来中美大国博弈态势探析

林宏宇 张帅

【摘要】本文尝试对 2010 年以来中美两国在国际安全领域的大国博弈以及由此形成的中国国家安全环境负面化态势做出一个系统阐释。2010 年中国 GDP 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崛起不再是国际关系学者的纸上谈兵，而是确实实的国际关系现状，这种状况客观上打破了东亚国际安全格局的平衡，对已有的安全结构造成有力冲击。深感“权力转移”之忧的美国试图以重返亚太（又称“再平衡”）战略来缓阻中国崛起的势头。此战略客观上极大刺激了东亚地区某些国家借美抗华的念头，它们试图以制造事端来“引美入亚”，希望美国“主持公道”。美国也愿借助这些国家对华挑衅来增强其再平衡战略的效果。面对某些东亚国家对华核心国家利益的挑战，和平崛起的中国不得不严峻应对，其后果是中国落个“四处树敌”、国家安全环境负面化的态势。但中国不会就此终结和平崛起之路，美国也不会轻易放弃其国际霸权，这就意味着中美此轮安全博弈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可能出现一段相当长时间的安全困境。然而主客观条件决定中美不会爆发新冷战，更不会爆发世界大战。面对挑战，中国不应采取同美国针锋相对的战略，而应在美国不威胁中国核心国家利益与安全的基础上，对内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外继续坚持“韬光养晦”和“不结盟”，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走出安全困境。

【关键词】 中美博弈；安全困境；新型大国关系

【作者简介】 林宏宇，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张帅，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硕士研究生。

An Analysis of the Big Gam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2010

By Lin Hongyu and Zhang Shuai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make a systematic explanation of the big game that has unfolded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2010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led to a deterioration of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environment. In 2010, the GDP of China surpassed the GDP of Japan for the first time, and China became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ic entity in the world, surpassed only by the U.S. The rise of China was no longer just empty talk of a few scholars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 the contrary, the rebalancing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relations changed and shook the existing security architecture in East Asia. As a consequence, the U.S. tried to use a pivot/rebalancing strategy to corrode China's rising momentum which objectively stimulated some of the countries in East Asia to oppose China with the help of the U.S. The U.S. also wanted to strengthen its rebalancing strategy's effectiveness via these countries' actions. In the face of the challenges from these countries on China's core national interests, China had to take the consequences seriously. But China will continue to adhere to the path of its peaceful rise whereas the U.S. will not give up its international hegemony easily as well. This means that the Sino-U.S. game will continue for quite a long period of time as will the security dilemma. However, it will not lead to a new cold war, let alone the outbreak of an extensive world war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In the face of challenges, China should not take on the same strategy as the U.S. Only if the U.S. does not threaten the core national interests and the security of China, China should focus on economics internally and externally adhering to the "keeping a low profile" and "non-alignment" principles. China should also strive towards building a new type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so that the security dilemma can end.

[Key Words] Gam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Security Dilemma,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Authors] Lin Hongyu,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Zhang Shuai, Master Degree Student of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所谓国际安全是指各国和地区在国际体系中得以生存，避免威胁的一种状态。¹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总体上在不断改善，但 2010 年前后，却出现负面化趋势。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向：一是美国，表现为美国实施对华色彩明显的“重返”（又称“再平衡”）战略；二是部分周边国家，表现为因领土领海划界问题引发的不断增多的安全事件。实际上，后者或为美国盟国（日、菲），或为近年来与美国快速接近的国家（印、越），其对华安全压力的源头也“间接”来自美国。因此，可以说 2010 年以来中美在东亚地区的大国博弈态势明显。本文试从中美大国博弈的背景、前景，以及中国的应对等 3 个方面阐释如下：

¹ 张丽：《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安全结构新变化与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安全研究》，2014 年第 2 期，第 131 页。

一、中美博弈的背景：东亚安全结构（环境）发生变化

东亚地区安全结构（环境）主要受4个因素影响：军事技术、国家安全观、区域经济合作和国内政治因素。2010年前后，中国崛起对东亚安全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促使美国加大了对东亚的安全投入，以巩固自身主导权，中美安全博弈由此展开。

（一）中国军事技术的发展打破了东亚安全结构原有的平衡

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安全力量由四大支柱构成：前沿驻军、快速机动的航空母舰特混舰队、立体战场信息（主要包括卫星、空中预警、雷达侦听）和远程打击力量（包括隐形打击力量）。

²由于中国长期缺乏有效的远程力量投送技术，广阔的空间成为美国安全力量的“天然掩体”，在同中国的较量中美国获得了绝对安全优势。

但近年来中国军事技术取得较大进步，大大提高了中国安全力量的威慑力。首先，远程打击力大幅度提高和完善。东风 21D 中程导弹的列装，配合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形成了有效的远程火力覆盖，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基地和航母的生存构成挑战。其次，中国信息战能力提升。2007 年中国就已经公开实验了第一枚反卫星导弹，2010 年歼 20 首次试飞，都在削弱美国的战场信息搜集能力。第三，中国网络战能力提高。解放军网战能力的提高，对美军指挥网络的有效性和保密性提出挑战，美军认为解放军正获得“力求‘致聋、致盲、致哑’美军及盟军部队”的能力³。

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已经使中国开始获得有效的阻吓力。阻吓的要点不是自己秋毫无损，而是要保证对方的损失是其无法忍受的就行。⁴在这一点上，中国正在日益取得成功，中国“反进入”和“区域拒止”能力日趋成熟，地理空间对美国安全力量的掩护作用开始下降。

（二）不同国家安全观的相互作用使然

国家安全观，决定了一个国家如何解读安全环境的变化，以及采取何种应对策略。同时，一个国家既是本身安全环境的消费者，又是本身安全环境的创造者。⁵地区安全环境是身处其中的国家共同创造的结果，单向的改变无法形成博弈。冷战后的东亚安全环境是一种美国主导的非均势安全结构，美国通过其亚太同盟体系获得东亚安全事务主导权，在亚太地区建立了一个“两级”化的非均势安全结构。在此结构中，各方追求的安全观不同。强势一方的安全观是追求绝对安全，而弱势一方的安全目标则降为生存安全。⁶

² 唐世平：《TMD 和科索沃危机后的中国军事战略选择》，《当代亚太》，1999 年第 10 期，第 29 页。

³ 胡杰民：《“空海一体战”理论透析》，《国防科技》，2011 年第 2 期，第 52 页。

⁴ 唐世平：《TMD 和科索沃危机后的中国军事战略选择》，《当代亚太》，1999 年第 10 期，第 28 页。

⁵ 唐世平：《国家安全环境的系统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 年第 8 期，第 16 页。

⁶ 阎学通：《东亚和平的基础》，《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 年第 3 期，第 11 页。

中国的总体安全能力提升是一个客观事实，以军费开支为例，1999年到2009年的11年间，军费从1076亿元增加到4806亿元。⁷在“两级”安全结构下，和平崛起的中国处于“两级”之间的中间地带，中国的军力上升对东亚安全结构形成上下两个方向的冲击。对上，削弱了美国在东亚的安全优势，考验着追求绝对安全观的美国对安全实力对比变动的容忍度；对下，中国快速增长的安全能力扩大了中国同其他东亚国家在安全领域的实力差距，使得部分同中国存在领土、领海争端的国家，担心中国在未来争端中采取强力措施解决争端，威胁其生存安全。

在绝对安全观指导下，美国试图以再平衡战略来缓阻中国崛起的势头，维护自身优势地位。而此战略客观上刺激了东亚地区某些国家借美抗华的念头，它们试图以制造事端来“引美入亚”，希望美国“主持公道”，平衡中国不断上升的影响力。作为一个域外国家，美国也需要借助这些国家对华挑衅来增强其再平衡的合法性和战略效果。因此，2010年以来，在中国周边地区出现了一系列涉及领海、领土的争端事件（如钓鱼岛、黄岩岛等），这些事件对中国而言，不同于一般的国际争端，它事关中国领土、主权完整以及安全信誉的可靠性，贸然退缩有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威胁中国的生存安全。因此，中国只能选择严峻对待，以提高军费开支增长速度作为回应。据新华社报道，中国2014年国防预算提高12.2%，增速比2013年提高1.5%。美国对此的反应就是继续加大对亚太安全的投入，即使在乌克兰危机深度发酵时，依然不放松对中国的安全压力，继续坚持对中国大陆进行抵近军事侦查。而日本、菲律宾和越南等国也纷纷追加国防预算，大量先进装备不断列装部队。东亚地区安全博弈出现了某种“安全困境”的趋势，而这种趋势正是不同的国家安全观相互作用的结果，单纯的试图通过增加安全投入改善安全环境，只会进一步恶化东亚安全环境。

（三）区域经济合作因素的影响

东亚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是国家的首要任务。因此，在东亚诸多非传统安全因素中，经济安全最具影响。两次金融危机推动了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进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暴露出东亚国家过度依赖美元和国际市场的脆弱性，而进入新世纪后，WTO框架和OPEC框架下市场开放进程逐渐陷入僵局，这一切都加强了东亚国家绕开WTO和OPEC，推动立足于东亚自身特点区域合作的决心。在贸易领域，各种FTA协定应运而生，以“东盟+1”为特征的自贸区建设纷纷启动。在金融领域，东亚国家启动“清迈协议”，推动东亚货币体系建设。2008年金融危机，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进程。2009年5月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第十二届“10+3”财长会议上，各方就“清迈倡议”多边化的相关安排达成协

⁷ 《中国历年军费一览》，网易，<http://news.163.com/special/junfei/>

议。此后，“清迈倡议”多边化建设进入快车道。随着各种东亚经济合作机制的推进，东亚各方对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兴趣日益增长，2009年10月23日，第15届东盟系列峰会在泰国华欣召开，“东亚共同体”成为此次峰会上最引人注目的议题之一。而东盟峰会的一系列协议，大都有中国的印记，多围绕中国展开，东盟国家多欲分享中国崛起带来的巨大的经济红利。这种趋势，不能不引起美国的忧虑。美国担心和平崛起的中国“试图影响该地区新兴的政治机制的结构，鼓励一个把美国排斥在外的东亚共同体的发展”，⁸任由这一趋势发展，中国有可能在未来的东亚共同体中，扮演今天德国在欧盟中的领导作用，但与德国不同的是，中国不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中国一旦获得东亚一体化主导权，美国将失去制衡中国的力量。

因此，阻止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进一步发展就成为美国的战略选择。实际上，美国历来就反对东亚合作进程，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的“东亚经济圈构想”、日本政府提出的亚洲货币基金构想等，都因屈服于美国的强大压力而被迫流产。⁹美国在东亚地区最强的是其安全实力，因此运用安全力量干预东亚一体化进程，就成为美国最佳选项。2010年前后，美国通过再平衡恶化东亚安全环境，不仅削弱了东亚国家之间的互信，阻碍了东亚区域合作，更凭此突出了美国安全优势，为其主导东亚事务创造切入点，加强东亚国家对美国的安全依赖，推动美国偏好的亚太议题展开。在目前这样的政治气候下，中日韩三国 FTA 谈判自然难以取得实质突破。而在安全领域，不仅美国的亚太同盟网络得到强化；在经济领域，美国偏爱的 TPP 在东亚合作中的影响力也日益提升。

（四）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

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从未实现“绝缘”，一个国家的任何重大对外政策都是国际国内相互影响的结果。中美两国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也成为此轮安全博弈的开始和继续创造了国内条件。

美国国内有两大坚定反华势力：军工复合体和国内极端保守势力。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为缩减政府开支，减轻政府财政负担，美国除逐步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外，就是制定长期缩减军费计划¹⁰。美国国内的军工复合体为维持自身庞大的利益，需要一个有力的外部敌人，以维持军费开支，中国就成为了不二选择。它们宣传中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危害了美国

⁸ John Lkenberry and Anne-Marie Slaughter, eds, *Forging A World of Liberty Under Law : US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Final Paper of the Princeton Project on National Security, September 27, 2006.

⁹ 江瑞平：《构建中的东亚共同体：经济基础与政治障碍》，《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9期，第64页。

¹⁰ “美国新出缩减政策 将消减军费开支”，《国际金融报》，2010年5月11日，<http://finance.jrj.com.cn/2010/05/1116167443117.shtml>。

的霸权，这成为奥巴马推出“重返”/“再平衡”的重要驱动因素¹¹。

2009年后“茶党”异军突起，标志美国国内极端保守势力抬头，“茶党”并不是传统政党，“茶党”运动成员囊括了共和、民主两党成员。其成员总体上对华持强硬立场，涉华态度呈现出更为强烈地干预与提防倾向，夹杂着意识形态与国家安全的双重考量。¹²在涉华安全议题上，完全持消极态度，茶党运动的兴起，减小了美国对华外交政策中的回旋余地。

中国国内社会结构的变化，也对加剧中美安全博弈起到推波助澜作用，那就是中国网络极端民族主义兴起。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一书横空出世，并成为畅销书，标志“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继五四时期民族主义运动之后的真正重新兴起了。”¹³网络从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大规模进入人民日常生活，迅速成为人民表达自己意愿的重要平台。民族主义同网络结合形成独特的网络民族主义，网络民族主义充分利用微博和博客等网络自媒体，拥有了快速传播信息的能力，不仅获得了以往民族主义者所难以拥有的影响力，而且这种影响力还在上升。网络民族主义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产物，但主体是缺乏社会经验的青年学生，在网络这样一个毫无约束的虚拟空间中，易走向极端，动辄主张使用强硬手段乃至武力解决正常的外交争端，形成网络极端民族主义。网络极端民族主义以简单易懂的两元世界观，获得了超强动员力，对中国外交政策从制定到执行的每个环节均形成强大制约。使中国在对外政策中难以采取更加灵活的策略，在面临任何外部刺激和挑战的时候，中国只能越来越多采取“针锋相对”的政策，使得事态呈现螺旋式发展。国内社会的变化，也减小了中国在此轮中美博弈中妥协空间。

二、中美安全博弈的限制因素

今年是“一战”爆发一百周年，柏林墙倒塌25周年，明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在此特殊的时间节点，不少媒体和学者将中国同德国和苏联对比，将中美目前的安全博弈比作“一战”前和“二战”前的英德博弈，以及美苏冷战。但笔者认为，各种主客观条件决定了中美此轮安全博弈不会升级为新冷战，更不会升级为世界大战。

（一）中国是一个维持现状意愿很强的国家

第一，在领土争端问题上中国历来主张通过政治途径和平解决。某些周边国家之所以跟随美国在安全领域遏制中国，部分原因在于担心中国强大之后会采取强力措施改变现状。

¹¹ 代表观点见王志军：《美国军工复合体与奥巴马对华政策》，《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9年第3期。

¹² 刁大明：《美国茶党的涉华态度极其成因》，《外交评论》，2013年第6期，第115页。

¹³ 薄明华：《论当代中国新民族主义思潮》，《怀化学院学报》，第26卷第3期，第19页。

但中国在领土归属问题上始终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这实际上是一种维持现状的表现。2010年前后领土争端集中爆发是因为部分东亚国家担心中国放弃这一原则引起。

第二，在国家发展道路问题上，中国与德国、苏联存在根本不同。现代德国诞生本身是对欧洲安全结构的重大修正，德国统一彻底改变了欧洲大陆的均势格局。1889年已经是欧洲第一陆军强国的德国，又通过《扩充海军法案》挑战英国制海权，这对当时的欧洲主导国形成巨大挑战。而苏联在经济上，坚持“两个平行市场”原则，同美国主导的国际市场相隔离；政治上，坚持对外输出意识形态；安全上，同美国展开全面竞赛。但中国不同，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走上民族复兴的“快车道”，这是一条不断融入国际体系之路。随着中国逐渐融入国际体系，中国不断调整自身的对外战略，从建国之初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谋求颠覆现有国际机制，到改革开放初期的防御性现实主义——接受国际秩序，到现在的自由主义——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表明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展开，中国对国际秩序认可度在不断提高。

第三，中国的安全力量服务于国内发展。“一战”前德国战略目标是争夺所谓“阳光下的地盘”，“二战”前德国将推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作为终极目标；而苏联则以建立全球霸权为国家战略目标，安全力量成为两者对外扩张的工具。但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才是中国的核心目标。中国大战略的中心目标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为中国集中精力搞发展（经济、社会与政治）塑造和维护一个有利的环境（安全、经济与政治）。¹⁴在这一战略框架下，中国的安全力量将始终服务于国内的发展，是防御性质的。例如，中国对待核武器的态度，最能表明中国的安全力量是防御性质的，不仅核武库存量低，而且还是至今唯一公开声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大国。

（二）时代背景的改变

时代背景，是对某个时期国际形势总体特点的宏观概括，它是我们判断国际关系走向的重要基础依据。当今的时代，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发展经济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和第一要务，各国间经济贸易联系之紧密程度是空前的。世界经济形态的这种改变可以有效遏制国家之间的武装冲突。“一战”前，原材料在国际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殖民地作为原料产地，拥有极高的战略价值。国际之间的经济竞争，极易转化为对土地等有形资源的竞争，战争成为解决争端的有效手段。但在“二战”后，技术和管理等无形资源日益重要，土地的经济价值在下降。经济竞争演变为创造力的竞争，战争在解决经济竞争中的效力不断下降。此时，经济联系成为国际社会的稳定器，而非动荡的导火索。同理，目前中美之间密切的经济交流，

¹⁴ 唐世平、张蕴岭：《中国的地区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6期，第8页。

将成为双边关系的压仓石。

另外，核武器的发展也是遏制大国冲突的重要时代背景。爱因斯坦曾说过“原子弹改变了一切，除了我们的思维”。核战争的巨大破坏力抑制了核大国之间战略冲动。“二战”后，有核国家从未爆发过直接武装冲突，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苏边境冲突和阿富汗战争中，中美苏等国都竭力避免冲突升级。

（三）美国自身战略结构的限制

全球层面，作为当今世界唯一霸权国家，美国始终需要在东西两线寻找战略平衡，这无疑将限制美国“战略东移”的力度与深度。为了维持全球霸权，美国必须对全球热点事件保持必要的影响力，乌克兰危机、叙利亚危机、ISIS 异军突起、利比亚内乱，美国始终难以实现“脱身”，这种肯定会限制到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实际上，冷战结束后，美国历届总统都有意实施亚太战略，但屡次被突发性国际事件（如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9.11”）所打断，2010 年的再平衡战略也难免如此。

地区层面，美国的再平衡战略有内在矛盾性。十年反恐战争，消耗了美国国力，美国无力独自承担如此大规模的战略行动，需要其远东盟友帮忙减轻负担，但美国对这种帮忙又有所顾忌，担心其盟友反客为主。例如，日本是美国在东亚地区“最有分量”的盟友，正是日本的加入才使得 TPP 具有实际意义。美国为实施再平衡，支持日本在东亚发挥更大的军事作用，默许日本在成为“正常国家”道路上越走越远。但是，我们要看到，美国并不愿日本成为一个有核国家，更不愿日本的军事政策威胁中俄生存安全。¹⁵日本在东亚的安全作用过度提高，同样会威胁到美国绝对安全的地位。再平衡战略的这种内在矛盾将削弱其最终效力。

正是因为上述这些限制性因素的存在，中美此轮安全博弈不会中美“新冷战”的开始，而是一个处于转型过渡阶段的磨合期，中美双方如能正确应对，完全可以避免“安全困境”，实现大国的战略和谐。

三、中国的应对

尽管中美此轮博弈不会发展为“新冷战”，更不会爆发世界大战，但中国仍需严肃对待，以防中美陷入一场双方都竭力避免的冲突。笔者认为，中国应采取以下应对：

（一）冷静研判此轮中美安全博弈的跨度和烈度。

中美此轮安全博弈不同于以往，双方博弈的时间跨度将超过以往。冷战后，中美之间

¹⁵ 阎学通：《东亚和平的基础》，《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 年第 3 期，第 12 页。

曾出现过三次严重的安全危机：1995-96 年的“台海危机”、1999 年的“炸馆事件”、2001 年“撞机事件”。应该看到这三次事件是偶发的，问题集中在一个领域，不涉及全局，可视为美国试探中国底线的一种挑衅性的战术举措。因此，当美国面对中国强硬态度和据理力争时，往往会较快地从原有立场上妥协和退让。但 2010 年前后爆发的此轮安全博弈起因不同以往，此轮安全博弈源于中美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带来安全实力接近，东亚安全结构发生变化。而美国在欧亚大陆的安全利益之一就是防止在欧亚大陆崛起区域性强权，损害美国霸主地位。能否控制欧亚大陆“直接影响着美国对全球的支配”¹⁶。维护霸权是美国的既定战略目标，任何一任总统都不会转变这一战略。因此，短期之内中美此轮安全博弈不会终结，换言之中国安全环境继续负面化的趋势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但是，此轮博弈的烈度要低于以往。尽管在规模和深度上，美国此轮战略调整堪称冷战结束后最大规模，但由于中美在东亚地区已经进行过多次安全博弈，对彼此的底线都有较好的把握，因此中美此轮安全博弈不大会再有美国航母编队突然云集西太平洋，中美冲突一触即发的高烈度场面。而可能更多的是中美双方在彼此战略外围的排兵布阵，消耗彼此的战略耐心和资源。美国更可能通过低烈度的安全事件和不断增加的战略压力，逐渐消耗中国的国力，缓阻中国的发展。

（二）对内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

1949 年以后的经验表明，只要中国能够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中国国运就处于上升状态，何时偏离这一道路，中国发展就遭遇困难。同时，苏联的经验表明，军备竞赛对于一个仍以发展为主要目的的国家而言，其代价何其高昂。因此，我们对内应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绝不能轻易偏离这一道路。

（三）对外要继续坚持“韬光养晦”，坚持不结盟，坚持开放的多边主义。

“韬光养晦”，并非如奥巴马所说“搭便车”¹⁷，相反中国一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国际责任。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参加维和人数最多的国家，也是无偿派出维和部队人数最多的国家。¹⁸长期以来力促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地区热点问题。同时中国也积极参与国际社会打击索马里海盗的行为，而且自建国之初中国就大力提供对外援助。“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是一体两面，并不冲突，同样可以有效地树立起中国的国际形象。

¹⁶【美】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2 页。

¹⁷“奥巴马：大国要主动帮助他国 中国只会搭便车”，《环球网》，2014 年 8 月 11 日，<http://mil.huanqiu.com/observation/2014-08/5101256.html>。

¹⁸“联合国副秘书长：中国无偿提供为何部队人数最多”，《网易财经》，2013 年 6 月 28 日，<http://money.163.com/13/0628/18/92FQ19AM00254UCG.html>。

面对来自美国的安全压力，国内有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应该放弃“不结盟”。¹⁹但笔者认为结盟战略并不会改善中国的安全环境。首先，缺乏有价值的盟友。单极体系下对美国制衡最强烈地是那些遭到美国敌视、生存完全没有保障的中等国家或小国。²⁰与之结盟并不会对改善中国战略环境有多大助益，相反很可能被反美政权拉入到不符合中国利益的冲突中。其次，缺乏结盟的战略环境。中国拥有众多邻国，贸然实行结盟政策，有可能使周边国家将中国的防御性行为理解为进攻性的扩张策略，将其推向美国的战略怀抱。再次，缺乏有利时机。当前国际社会都知道中国急于改善自身安全处境，中国如此时实施结盟政策，极有可能导致结盟对象开出更高的要价，加剧中国战略负担。

中国在安全领域真正需要的是开放的多边主义。东亚地区多边安全机制发展缓慢，但多边经济合作机制发展迅速。尽管经济领域中国同东亚国家同样存在冲突与矛盾，但经济矛盾与冲突集中在技术领域，未影响双边关系，反而各方之间的经济联系得到不断加强。中国积极参加乃至主动发起多边安全机制，这将有助于提升中国承诺的可信性，缓解东亚安全体系内成员国对中国安全能力的猜忌，推动在安全领域的合作，进而改善中国的安全环境。

（四）面向未来，大力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无论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亦或是“韬光养晦”和“不结盟”，都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坚持实施这些政策可以有效避免中国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但并未从根本上化解中美之间的战略矛盾，最好的结果是在中美之间建立一种“新型大国关系”²¹。中美之间的矛盾是“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对冲造成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随着中美国力接近，双方冲突的可能性在不断增加，但是“极可能”并不等于“不可避免”。²²中美双方需要“未来理论”去解决“历史难题”，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正是中国为应对时代挑战而提出的全新战略构想。2013年5月，习主席在访美会晤奥巴马总统时，将新型大国关系概括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的理念。尽管，作为一个新兴理论，新型大国关系本身尚在发展过程中，对中美关系的最终影响也未有定论，但即使是中美在亚太地区持续爆发安全对立之时，双方都没有放弃新型大

¹⁹ 代表观点阎学通：《阎学通：中国外交可考虑改变不结盟战略》，新华网，2011年5月31日，<http://news.eastday.com/c/20110531/u1a5919035.html>；《阎学通：中国应放弃不结盟政策 周边12国为结盟对象》，凤凰卫视，2012年7月9日，http://phtv.ifeng.com/program/hydzl/detail_2012_07/09/15883874_0.shtml；唐世平：《联盟政策与中国安全战略》，《领导者》，第36期；戴旭：《中俄应建立欧亚大联盟》，《环球时报》，2012年1月30日。

²⁰ 刘丰：《单极结构下的体系效应与国家行为——兼论中国的战略选择》，《太平洋学报》，2011年第7期，第50页。

²¹ 杨洁勉：《新型大国关系：理论、战略和政策建构》，《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3期，第11页。

²² 【美】小约瑟夫·奈、【加】戴维·韦尔奇：《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张小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6—27页。

国关系的提法，就表明“新型大国关系”提法的生命力，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乐观的信号。目前，我们可喜地看到，中国的提法正逐渐得到美国的积极回应，美国也逐渐开始从最初的强硬立场后退，转而采取一种“灵活推回”战略²³，这不可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²³ 参见郑安光：《美国对华“灵活推回”战略评析》，《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3期，第1—8页。